

高尔基的“海燕式”剧本《底层》浅析

娄 力

高尔基是一位“属于全世界”的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文艺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①作为小说家,他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然而作为一位剧作家,他的成就也是显著的。他一生中写下了二十部左右的剧本。仅在二十世纪初,1905年及以前几年,他就成功地写出了《小市民》(1901)、《底层》(1902)、《避暑客》(1904)、《太阳的孩子们》(1905)、《野蛮人》(1905)等剧作。这些剧本题材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采,既写出了先进工人阶级的形象,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同时还深刻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

在戏剧创作中高尔基继承了契诃夫的优良传统,重在表现时代精神和心理描写。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传统,使剧作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性和哲理性。他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剧本,而且还对戏剧创作发表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

高尔基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向将戏剧创作看成是“一种庄重和严肃的事业”(1900年1月21日致契诃夫的信),是及时反映时代最强音的革命事业。这就是说,戏剧要在表现时代冲突中塑造时代的英雄人物,这些时代的英雄人物应该是积极创造世界的主人。此外,作家要求戏剧舞台上出现生动的典型人物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此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人们斗志的社会作用。高尔基在《论剧本》一文中写道:剧本中“每个人都显然被赋予了阶级的和‘职业的’特征”,“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戏剧应该是现实的、

有情节的、充满着行动的”。作家认为要使剧作中的语言“具有艺术价值和社会性的说服力,就必须使每个人物的台词具有严格的独特性和充分的表现力”。假如“语言贫乏、枯燥、贫血和没有个性”,那么“一切剧中人物都说结构相同的话,单调的陈词滥调”,“在舞台上全变成了呆板的、胡乱联系起来的语言所发出的无聊的喧嚣”,这在作家看来简直是“可悲的缺点”。与此同时,作家还指出:剧本必须适合演出,而且表演要规范化。为此,高尔基在他每一个剧本上演之前,都给每个角色写出长篇的对人物演出的理解和要求。

出色地体现了高尔基的这些创作思想的,因而在艺术上成就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第二部剧作《底层》。它是作家于1902年在阿尔扎马斯流放时写出的。作家自己曾说:“这是我对‘沦落人’的世界将近二十年观察的总结。”^②在剧中他高度地概括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流浪女,利用舞台艺术的特殊条件,把他们一起安排在“一个象洞穴似的地下室”里。在夜店里住着的有小偷、妓女、赌徒、游方僧、手艺人、小贩,还有落魄的贵族、潦倒的戏子和奄奄一息的病妇等人,他们都是被生活逼迫栖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夜店里的房客,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无情的摧残,变成社会上没有劳动条件,也无条件劳动的一群人。这些沦落到“底层”的人们也在挣扎,向往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他们的希望不断破灭,接连遭到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最后均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底层》的社会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对吃人的旧社会发出了强烈而愤怒的控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把大批失业的劳动群众推入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逼迫着这些人在社会“底层”去犯罪，使他们变成“不象人的人。”这里，作者将俄罗斯的黑暗现实浓缩到这个舞台上的黑暗夜店里，而这个夜店在作者笔下活象一座监狱，让它的房客们唱着“牢狱之歌”这是寓意颇深的。这些人被生活彻底击败，失去了反抗能力，然而，他们还思念着美好的生活。在对待人生的出路问题上，却存在着极其对立的观点。

剧中有三个代表三种对人生不同看法的人物：宣称“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的流浪汉萨金，以谎言安慰人的游方僧鲁卡和介乎这两者中间的帽匠布伯诺夫。布伯诺夫与鲁卡一样，相信人世只有残酷、黑暗的生活，这种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不同的只是，鲁卡用美丽的辞藻和美妙的谎言来装饰这一现实。布伯诺夫与萨金相同之处是反对用同情和谎言安慰人，然而，萨金相信人们有力量以自己的智慧和意志战胜苦难重重的、奴役人、窒息人的“底层”生活，而在布伯诺夫身上却完全缺乏这种积极改变人生的信念。

剧本的中心问题是探讨如何挣脱“底层”的枷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集中在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鲁卡和萨金的冲突上体现出来的。作者对人的无限信任和尊重的观点是通过剧中人萨金讲出来的。虽然他并不是剧中的正面人物，而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流浪汉。然而，萨金表达这种对人的信念的独白却具有特殊的意义。萨金与夜店中其他的房客不同，他坚信人不应该向现实生活屈服，而应使现实生活为人服务，他说：“人就是真理……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自豪！人——一定得尊重人！不要怜悯他……不要拿怜悯去污辱他……”在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的人中发出这种呼声，有如一束阳光照亮了黑暗的牢房。这种

思想无疑是积极的，而这也是反映了高尔基的著名的人学观。

高尔基在论述如何写人的评论文章中，在自己写人的创作实践中，一贯强调要歌颂人、尊重人、解放人，同时也要改造人，并与摧毁人、压迫人、侮辱人等社会现象作斗争。作者不但在上述萨金的台词中歌颂人，而且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刻画表示出，他们都各自具有独特的、人的高尚的感情，这些感情被压抑得无法充分表现出来，这是把人们打入“底层”的社会制度的罪过，因而必须要解放人。

高尔基在歌颂人的同时也看到在人的生活中还有丑恶的一面，即不劳而获，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们。因此，作家指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的生活应当是有意义的。在人生意义方面高尔基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歌颂了劳动的光荣和伟大。在作者的笔下劳动——这就是使人成为高尚的人的力量，使人尊重，成为真正的人，成为能够改造世界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然而，在萨金身上正好缺乏的是这种对劳动的热情。虽然他性格豪放，胸怀开阔，富有自尊感和对现实的反抗精神，即作为“临时的英雄”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具备。他也时刻不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对此充满信心，但是，萨金的这种信心是难以转化为行动的，因为他已经不习惯从事真正的劳动，甚至反对劳动，他认为劳动是奴隶们的事，所以他不可能理解，受苦的人们之所以沦入“底层”，正是因为剥削阶级使人民群众作牛作马，他们却可以不劳而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因此，萨金也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斗争。他已经成为一个“被生活击溃的人”，作者在谈到这个剧本时说：“我不能借着被生活击溃的人的嘴来宣传社会主义”。

尽管萨金身上存在着种种不符合正面人物条件的弱点，但他毕竟高出于夜店里的其他人，也高出于舞台以外的许多当代人，所以作者只能通过他表达一些自己对人的赞

美。然而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这里并不是抽象地谈人，而是从人的阶级性这一点出发来观察问题，塑造人物的。

与萨金对人生的态度相对立的是游方僧鲁卡所代表的怜悯思想，他表面善良，对人亲切，竭力安慰人，毫不费力气地靠谎言过日子。他是一个“诚诚恳恳撒谎”的基督徒。实际上，他根本不相信人的现实是能改变的，所以他才用美丽而渺茫的梦想麻醉他周围对改变现实还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他保证小偷贝贝尔和娜达莎可以到“遍地黄金”的西伯利亚过美好的劳动生活；他聚精会神地欣赏过妓女娜恩佳编造的大学生热恋她的故事，并鼓励她继续去做奇异的爱情美梦；他保证中了酒毒的戏子可以到一所富丽堂皇的免费医院里去恢复健康；他还安慰呻吟在床上的安娜死后可以升入天堂……

他这种假惺惺的安慰只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失望和痛苦，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所有的谎言。鲁卡的这种人道主义是虚伪的、骗人的，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劝导受苦受难的人们长期容忍地狱般的生活，使他们脱离现实社会的斗争，靠幻想过日子。实际上，这个怜悯人的安慰者是最无情的宗教徒。他的“真理”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他的谎言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因此，他趁着大家混乱的时刻，悄悄地溜走了。他的谎言和安慰所起到的唯一的实际作用，那就是他为安娜编造的“天国”神话，多少减轻了一些她临终前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应该说，鲁卡的说教只对垂死的人有用，对活着的人只会有害，作者恰恰是以此揭穿基督教徒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和消极、反动作用。萨金在剧中说得好：“我看透了那些谎言！谁居心不良……或是靠榨取别人的血汗过活，谁就需要撒谎……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话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

在作家晚年时，他谈到自己的剧本《底层》里的人物鲁卡，曾指出“还有大批这样的安慰者。他们安慰别人，只是为了要别人不

对他们的牢骚感到厌烦，不去扰乱他们那逆来顺受的冷淡灵魂一向对一切事物的平静态度”。“这一类安慰者是最聪明、最博学和最雄辩的人。因此他们也是最有害的”^③。由此可以看出，高尔基通过萨金之口所赞美的人，并非抽象的人，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也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作家认为，真正革命的人道主义首先要捍卫人民的生活权力，并与摧残人、压迫人的制度积极斗争，否则，只单纯地呼吁慈善、怜悯，只对受苦受难的人进行安慰，而不与造成苦难的社会进行斗争，这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有如鸦片一样，麻痹人民，毒害人民，这是高尔基所坚决反对的。

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沦落及对人生的探索，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如何将大批民众抛入“底层”，使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同时也表明，应该怎样改变这种生活，打破套在他们身上和精神上的枷锁。这两个命题就是剧作的中心思想。作者所以能够成功地完成以上两个命题，一方面是，由于作家本人也曾长期地生活在“底层”，非常熟悉“底层”的各种人物，深刻地了解他们，无限地同情他们，并且挚诚地热爱他们。正如鲁迅曾经指出的：高尔基“是‘底层’的代表”^④，作家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⑤。然而，亦不可忽视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即作家不仅熟知他笔下的人物，而且是处在1905年革命前夜这个历史条件下，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上，所以才能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些人物，看出萨金之不足和有如鲁卡这类人物的本质。这与作家本人当时的思想境界是紧密相联的。

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在高尔基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就是他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日益密切。从1901年起，他就开始接近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在《火星报》所宣传的思想影响下，作家本人亲自参加了1901年3月，在

彼得堡喀山大教堂附近发生的学生示威游行，并在反对沙皇政府镇压群众的抗议书上签了名。

高尔基直接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进一步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在迅速觉醒，作家深感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1900年致契诃夫的信），因此，作家以其参加革命运动的体会和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的坚定信心，更加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了他所熟悉的底层人物，并通过这些人的生活表明革命必然到来，这个剧本对准备1905年革命也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因而它是一本杰出的“海燕式”的剧作。

《底层》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技巧也是很突出的。它的高超之处在于，此剧并不追求惊奇的转折和意外的情节，它的舞台效果是通过剧中各类“底层”人物之间带有哲理性的交谈和争辩取得的。由于《底层》是一部社会政治哲理剧，因此，剧本的政治倾向便使它不单纯给人一种“底层”生活的沉重压抑感，而是从整体上使人体验到，尽管“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底层”人们的窗前，但鼓舞人们去“挣脱铁链”的信念却贯穿始终。剧作者通过角色之间双关语的对话，用词的各种特殊意义以及其它技巧，使得《底层》一剧里同时交织着黑暗与光明，忧伤和欢笑。作者有意识地在剧中不安排大量的阴暗、肮脏的生活细节，以突出对未来的信心。

剧本《底层》充满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由于鲁卡的到来而急剧地尖锐起来，一方面，这些流浪汉和流浪女不断沉沦下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美好的生活，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冲突只能使很多人的结局是悲剧性的：有的病逝，有的自杀，有的被逮捕……剧中人物都是非常个性化的，“戏子天生有一种诗人的、知识分子的气质”，“男爵身上明显地露出了堕落的特征和寄生生活的习惯”，“贝贝尔有坚强的性格，他还没有耗尽自己的力量；他梦想生活……”人物

的独特个性是通过语言的个性化表现出来的：“他们中间每一个人说的话都符合他的社会本性，都符合他的心理。戏子的语言属于可以说明他过去的职业的特征，男爵的语言充满了对他过去的回忆，娜思佳的语言的特点是有很多从她所喜欢的黄色小说中汲取来的句子，鲁卡的语言带有农民语言的特点”。⑥萨金的语言生动有力、意味深长，而且喜欢说一些“奇妙的词儿”，时常夹杂着几个外文词儿，以此显示他在电报局里做过事，“念过很多的书”。剧中人物的个性都是与阶级特性有关的，作者将二者巧妙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如高尔基在《论剧本》一文中所指出的：“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阶级特征不是黑痣……”。

《底层》是高尔基戏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一个剧本，因而刚一问世，立即获得社会上的热烈反映。1902年12月18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在莫斯科，两个月中就演出了五十余场；在彼得堡，场无虚席。《底层》在西欧也得到广泛的好评，它首先在柏林上演，在一个剧院的两年多时间内，就上演了五百场，不久它便演遍了欧洲各国的舞台。尽管沙皇政府千方百计地企图禁止这个剧本的上演，但未能得逞。《底层》对迎接即将到来的1905年的风暴所起的革命作用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它文学价值之高和社会作用之大。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底层》是列宁喜爱的剧作之一。契诃夫也给予它高度评价。早在解放前，《底层》就在中国出版了多种译本，而且由我国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将其改编为《夜店》，不但在舞台上上演，还搬上了银幕。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起到了鼓舞群众，号召群众起来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革命作用。

我们今天与《底层》中所反映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赶跑了“守望的狱卒”，

（下转第22页）

公司内各厂的协作关系是行政包办的“婚姻”，情不投意不合也不能散伙。提供协作件的厂就躺在公司的保护伞下不求进步。目前公司往往不属企业型，不负经济责任，于是“大锅饭”就越吃越大。所以，这类公司一经组成，下属的工厂有的自己不求进步，也不让别的工厂争取先进，不让别的工厂同公司以外的先进厂协作，把大家都捆在一起混日子。咨询组一进洗衣机厂，就遇到这一问题，即当时为解决外购外协件问题有两种方案。一是原来已提出的方案：组织紧密性的洗衣机总厂，把有关连的厂拉进来，捆在一起，实行协作关系“终身制”；另一种方案即咨询组提出的方案：招标，“自愿恋爱”，合得来就合，合不来就散。谁都别想吃“大锅饭”，谁都要用改进经营管理和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优良服务来取得对方的“喜爱”。这种协作关系既有相对稳定性，而又不搞“终身制”。这就有利于推动各有关企业前进。现在事实证明后一方案是可取的，大家都承认幸亏没有仓促地组织总厂(公司)，否则该厂的包袱就会更重，经济效益会更差。当然，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条件成熟的可以成立公司。但即使成立公司，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协作关系仍然可以通过招标来实现。

(4) 招标有利于推动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生产与流通这种辩证关系,是社会再生产一条基本的客观经济规律。

过去，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在极“左”路线下，重生产，轻流通，认为流通是可以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摆布的，把流通完全置于某些地方、部门的行政机构，实际上是置于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之下，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必然发生上面提到的那些弊端。结果，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不仅流通被搞乱，搞死，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甚至是非社会主义的关系，而且反作用于生产，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实行招标，正可以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的关系一刀两断，使流通中的关系正常化，使商品流通能按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以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推动作用。

总之, 综上所述, 招标有利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有利于突破条块分割, 有利于在部份企业之间建立合理的协作关系, 有利促进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

(上接第84页)砸碎了缠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千斤铁链”。“太阳出来”了,“永远是黑暗的监狱”不见了。然而,今天重读这部闪光的剧作,它仍然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这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万恶的旧世界。不断地回顾黑暗的过去,才能更加珍视光明的今天,从而启迪着每一个读者和观众,应该象作家所指出的那样去对待生活中的丑与恶,并以积极的斗争姿态,满怀信心地为

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注释：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
- ②③ 高尔基：《论文学》第72、74页。
- ④ 《鲁迅全集》第7卷，第824页。
- ⑤ 《鲁迅全集》第6卷，第549页。
- ⑥ 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上卷）第97、—101页。